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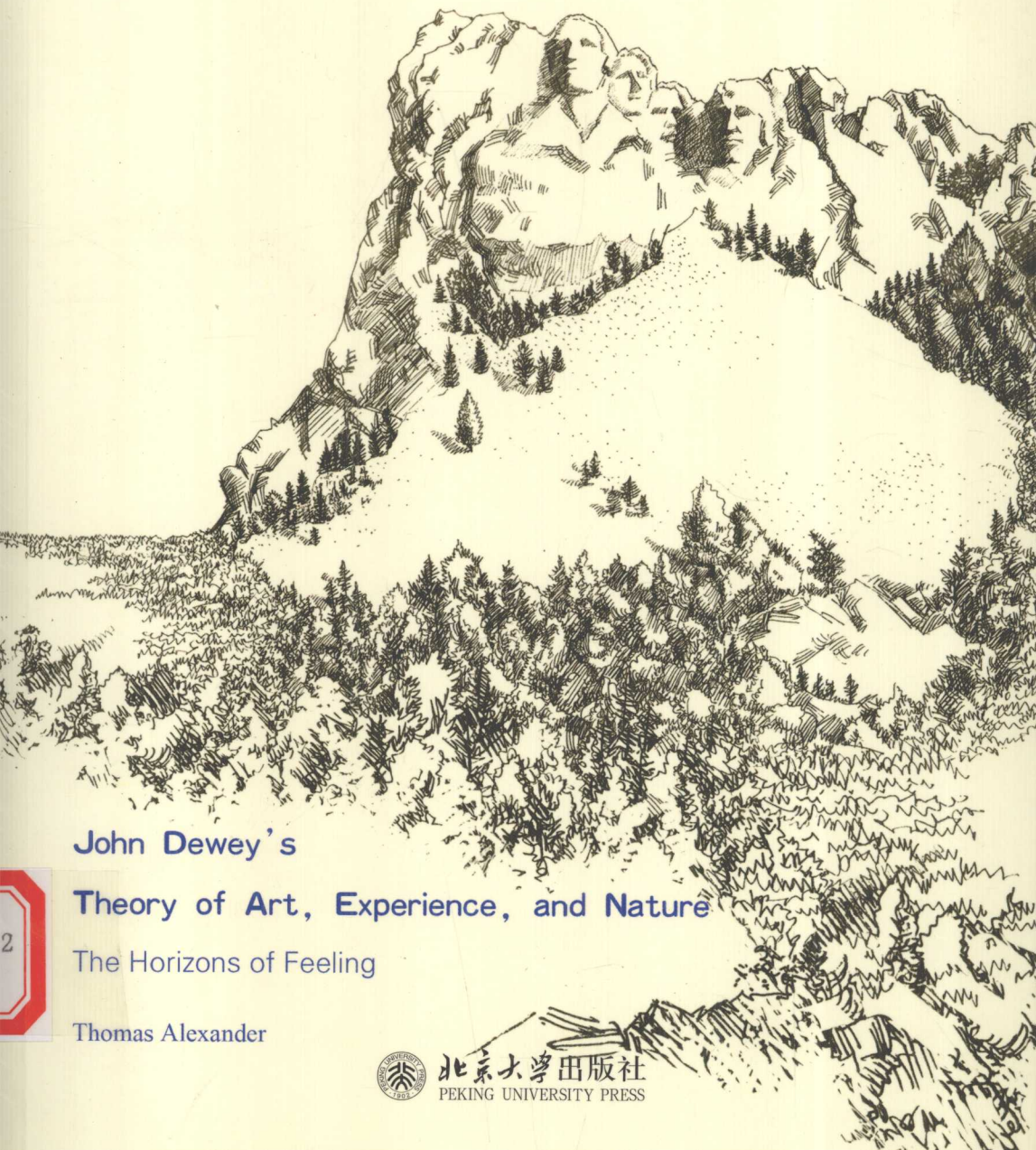
同文馆

★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

[美] 亚历山大·托马斯 著

谷红岩 译



John Dewey's

Theory of Art, Experience, and Nature

The Horizons of Feeling

Thomas Alexand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同文馆

B83-097.12
T963

★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

[美] 亚历山大·托马斯 著

谷红岩 译

John Dewey's

Theory of Art, Experience, and Nature

The Horizons of Feeling

Thomas Alexand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37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感受的诸视野/(美)托马斯·亚历山大著;谷红岩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同文馆·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6387-0

I. 杜… II. ①亚…②谷… III. 杜威,J. (1859 ~ 1952)-美学思想-研究
IV. B712.51 B83-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8214 号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is made possible by permission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87, and may be sold only in P. R. China.

书 名: 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感受的诸视野

著作责任者: [美] 托马斯·亚历山大 著 谷红岩 译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387-0/B·086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2.75 印张 35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献给吉尔

爱是聪慧的陌生人,陌生的自我。

——爱默生

人类的一位忠诚之友；几乎是人类进步唯一的朋友……我不想象他会死；大自然是舍不得放他走的。

梭罗《瓦尔登湖》*

* 见徐迟译,《瓦尔登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250页。——译注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

——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再次对话

孙有中 彭国翔 安乐哲

新世纪伊始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似将成为这个世界各个层面的最重要的保障。不过这种被双方利益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关系并不稳固,甚至有时还很脆弱,并且由于中美文化间缺乏深入的理解,双方的关系亟待推进。要推进这一关系不仅需要能够传达共同价值和文化渴望的词汇,同样也需要一种能够表达相互差异的语言,这种差异使文化交流成了相互激发和丰富的契机。

这个译丛介绍的是对美国哲学的研究性著作,而且初衷是为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真正的本土哲学,在介绍的过程中,纠正人们对实用主义的流误俗见:实用主义鼓吹的是权宜之计和投机主义,不配被视为伦理学。

这个译丛更大的雄心是鼓舞人们接续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的对话。为此,丛书的主编甄选出书目,经过相关领域的行家里手的倾力翻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努力,最终呈献给中国学界和广大读者。

毋庸置疑,在美国哲学与中国的“夙交”中,杜威是最重要的代表。就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杜威在其哥伦比亚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的热情邀请之下来到中国。当时胡适和蒋梦麟已经在学界和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崛起,成为重要的革新者。在华的两年间,杜威在华夏大地周游讲学,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体不惜笔墨,广为报道。但罗伯特·克罗普顿和吴俊生在其编纂的《约翰·杜威:中国讲稿1919—1920》中说:“杜威在中国大学里的哲学学者中间没有赢得多少拥趸,他们在欧洲



受的教育,也继续师从德法的哲学潮流。”^①在当时烈火烹油的革命狂热下,杜威的思想被当时的激进听众望文生义地“误读”了。他们觉得杜威的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需要更有效用,而非对专业的哲学领域。这种对杜威的误读只要不加以助长,是可以谅解的。^②

如今,我们有条件按照美国哲学本然的革命性品质对其进行重读,儒家哲学和美国哲学间的声气相通已被当代学界所察觉,在这两个传统中进行对话的里程已然发轫。

这一对话的开始之际,我们或许会受到这个事实的鼓舞:自称是“美国”哲学家的移民怀特海说过:“要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要了解详情杜威,去读孔子。”^③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进一步指出,他的“有机主义哲学似乎更接近中国思想的某些流派”^④。可是,同样是这个怀特海,在其他地方也曾经有点大言不惭地宣称:在哲学活动中,有趣比真实更好。综合这两点来看,怀特海这种地位的哲学家建议我们将和他“同父异母”的同胞杜威和更具异国色彩的孔子加以串读(tandem reading),这即便不是作为真理的谷仓,而是作为启迪的源泉,或许更佳。不过,真理却是所有事物中离我们最遥远的。

怀特海对于他与杜威和孔子所共享的那种过程性的感受(process sensibilities),似乎多有忽略,并且,怀特海在事实上也显然没有深思作为“实用主义者”的杜威和孔子。在怀特海看来,杜威和孔子都服膺于那种他所认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naive empiricism),而除了屏蔽掉最枯燥乏味的哲学探险之外,那种经验主义自身也乏善可陈了。怀特海在将杜威和孔子联系起来的审视中,重演了威廉·詹姆斯在《实用主义》(1907)中辨识出来并加以说明的两难困境,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

① Robert Clopton and Tsuin-chen Ou, *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3, p. 13.

② 见顾红亮《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亦可参见张宝贵《杜威与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③ 参见 Lucien Price,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4), p. 145.

④ *Process and Reality*, Donald Sherbourne correct edition, N. Y., Free Press, 1985, p. 7.

的这一困境常常使我们的哲学进路遭受挫折。^⑤

怀特海首先有力地批判了唯理论的基督教神学,通过真理的形式化而驱逐了新奇妙趣。他接着突然转而攻击杜威和孔子,说他们创造了一种逃避了终极问题的经验主义,而终极问题是经验中简单事实的基础。此处,怀特海将孔子和杜威明确地批评为这样一种实用主义者:即将兴趣局限在单调的事实上,从而遏制了这种大有潜力的情况:那就是所谓“愚蠢”和“多余”的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新奇思路。怀特海对孔子太苛刻了,在他看来,孔子导致了一个事物停止变化的时代,他责备孔子造成了中国文明的僵化凝滞。^⑥ 不过即便在他轻蔑的评论中,怀特海仍旧认识到儒家哲学的实用主义向度,这至少有助于鼓舞我们通过揭示杜威和孔子的深刻来捍卫这两位思想家,以对抗怀特海本人的傲慢。

事实上,在怀特海所处的时代,对他本人以及他的同行来说,在杜威与孔子之间进行比较的任何思路都令人迷惑。但是,从目前的高度而言,我将论证:我们能够界定一套看起来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彼此相关的历史境况,多年之后,这种境况或许会得到权衡与考虑,并且,作为事后之见,或许还会被诠释为那样一种情况,即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这样一种对话。我们目前的世界是否正在发生显著的改变,能够使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珠联璧合呢?杜威的归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一次不再遭遇五四运动的漩涡,杜威能成为一股助力去推动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吗?随着七十多个孔子研究机构在全美国的建立,对儒家哲学的精微理解最终会到达美利坚的海岸吗?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几乎全部是欧洲哲学,并且掌控了世界最高学府的坐席和课程,在波士顿、牛津、法兰克福和巴黎如此,在北京、东京、汉城和德里也差相仿佛。如果亚洲哲学和美国哲学在海外受

⑤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2000).

⑥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p. 176-177.

到忽略,那么在它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中,它们也同样被边缘化了。^⑦

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利坚,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哲学等旗麾之下,西方哲学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批判。这场批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所罗门(Robert Solomon)的话来说就是“超越的伪装”(the transcendental pretense),诸如观念论、客观主义、宏大叙事(the master narrative)和“所予的神秘”(the myth of the given)。当然,在杜威所说的“哲学的谬误”(the philosophical fallacy),批判的也是同一个目标。“哲学的谬误”激发了杜威对观念论和实在论两方面的批判,杜威批评的是这样一种假定:一个过程的结果反而被当成了这一过程的动因。^⑧

过去的二三十年,尤其在美国国内(不仅仅在美国),我们见证了古典实用主义兴趣的复苏,其标志就是对美国哲学演变的深入研究与

⑦ 诚如 Raymond Boisvert, *John Dewey: Rethinking Our Time* (Albany: SUNY Press, 1998) 一书中所论:在 20 世纪初,美国哲学家不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曾荣耀一时,但其影响在二战之前就烟消云散了。Harvey Townsend 在其 *Philosophical Id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4) 中指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美国哲学的状况:

美国哲学在美洲是一个受到忽略的研究领域。之所以如此,部分地出于对欧洲的敬重。爱默生(Emerson)和惠特曼(Whitman)呼吁美国人思考他们自己的思想,歌唱自己的歌曲,他们的呼吁仍然被置若罔闻。无法完全说服美国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灵魂。

在随后两代人,这种偏见仍旧显而易见。在《剑桥西方哲学史》(1994)的前言中,当提到该书不同部分的作者时,主编 Anthony Kenny 指出:“所有作者都受过英美传统的训练或授教于英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作者都属于英美的哲学风格。”但是,在该书的主体中却并没有提到美洲的思想,没有爱德华兹(Edwards)、爱默生、皮尔士、詹姆斯,也没有杜威。有关美洲所提到的东西,只有在索引中出现的“美国革命与柏克”、“托马斯·潘恩”、“杰斐逊”,并且杰斐逊在正文中是作为“潘恩的朋友”出现的。显然结论是:美国哲学,即使是接近英美传统的思想家们,在塑造西方思想特征的过程中也作用甚微。委实,在美国,很少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研究项目能够使学生直接受到美国哲学的认真而持久的训练。就像日俄战争是在日俄两国之外的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一样,美国的大学当前也基本上是各种外国学术角力的战场。

⑧ 杜威早就看到,作为“哲学思维最为流行的谬误”,就是忽略经验的历史的、发展的和情境化的方面。正如他所见到的,其中方法论的问题出在:“从赋予个别因素以意义的有机整体中抽象出某一个因素,并将这一因素设定为绝对”,然后将这一个因素奉为“所有实在和知识的原因和根据”(John Dewey, *Early Works* 1:162)。有关历史、发展以及“哲学谬误”的脉络,参见 J. E. Tiles, *Dewey: The Arguments of the Philosophers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 19-24。

日俱增,其中最好的就在这个译丛之中,这些凸显了杜威的贡献的专论把杜威的特点总结为:将常见的语汇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加以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当代学者们正在讲述一个重要的新故事,如今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杜威的中国学生没有真正理解他,其实扩而言之,如今的美国学生何尝不如此。

直至晚近,专业的西方哲学仍然忽略亚洲哲学而怡然自若(更不用说非洲和伊斯兰传统了),他们对于这些传统是怎么回事并不在意,这些哲学只不过是他们脑海中一些匆匆而过的印象。西方哲学乞灵于这样的理由:那些思想流派并非真正的“哲学”。如此一来,职业产生了“比较哲学”这样一个术语。这是一个奇怪的范畴,它与其说是在哲学上得到论证,还不如说在地域上得到说明。

但是,在“经典与多元文化主义争论”的脉络中,由一种在美国大学教育中推行“国际化”的明智需要所驱动,非西方的各种哲学传统已经我行我素地对哲学系的课程构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入侵”。从熙攘的世界会议到檀香山比较哲学的小圈子,再到波士顿儒家,比较哲学运动已经肩负重任,并且在目前看似巨大的西西弗斯式的劳作中也创造了某些契机。对比较哲学运动来说,胜利仍旧遥远,但是,即使有朝一日当胜利到来时,那将会是一场仁慈宽大的凯旋之舞,也就是说,在这场斗争中,成功也就是将“比较哲学”这一别扭的范畴从哲学词典中废除而已。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边,如今的中国不再满足于做世界的唐人街,而是正在经历着其悠久历史中最大和最彻底的变革。虽然当代西方哲学忽略了中国,但自从清季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引进以来,中国人广吸博纳以求富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一方面忠于自己的传统并具有活力,一方面又是具有吸收力并绝对是“比较性的”。在20世纪,马列主义经过几代人不断中国化,而刚开始的杜威实用主义以及儒学则被取而代之。同时,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许多杰出人物像张君勱、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则从欧洲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中寻找标准,将中国思想视为二流的概念(*Chinese second order thinking*)论证为一种值得尊重的哲学传统。不过对于我们所期待的对话而言,要注意的是:在五四时代儒学与杜威最初的相遇中,儒学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

分子们斥为阻塞中国动脉的血栓，妨碍了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那些新观念的鲜活流通，而杜威则被当成了一副解毒药。

今天中国当代哲学有了明显的发展，从初期的康德、黑格尔，到现在的维特根斯坦，尤其是现象学和海德格尔。从康德到海德格尔的兴趣转变对于儒家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对话的开启关系重大，尤其是对于本土思维的现代相关性，就更为重要。^⑨ 中国主权在 20 世纪中期的重新确立，以及最近几十年，中国作为一股世界力量的稳步成长，始终伴随着一种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更新的、批判的意识，以此作为自我理解的资源和平台，来应对被耽搁的但却不可阻挡的全球化。

然而欧洲哲学曾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标准的哲学，西方学术中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被中国学者公允地忽略了，因为他们发觉自己很难从西方人对中国传统的思考中学到什么。过去的几十年，力图对中国文化进行转变和阐释的中国学者从关注被忽略的中国学者要贡献什么，扩展到了文化争论，并且对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也日益关注。西方汉学的翻译和讨论在中国获得了斐然的反响。

这种相互渗透和补充的条件环境已经为开启美国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之间的新对话搭起了舞台，儒家哲学随着中国人对其传统的自尊和自豪感的生长已经恢复了显赫的位置。这套丛书是我们以及中国学界同仁认为的当代美国哲学研究中最好的著作，是我们推动这一对话的努力。

彭国翔 王立刚 译

（编按：孙有中教授审读了丛书中《杜威与美国民主》、《造就道德》、《理解杜威》、《阅读杜威》等译稿；彭国翔教授审读了《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杜威与道德想象力》、《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等译稿。）

^⑨ 见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一本学术书，该书获得了出乎预料的欢迎。

致 谢

对于帮助我完成本书的那些人,我致以最深的谢意。特别是我的妻子吉尔·E. 当斯(Jill E. Adams)、我的父母休伯特(Hubert)与米尔德丽德·亚历山大(Mildred Alexander)、埃默里大学的詹姆斯·古安洛克(James Gouinlock)博士、约翰(John)、贝弗利(Beverly)与丽贝卡·特罗思(Rebecca Troth)、E. 梅纳德(E. Maynard)与菲莉丝·亚当斯(Phyllis Adams)、加里·塞拉西(Gary Cesarz)与罗伯特·里夫斯(Robert Reeves);也要感谢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威廉·伊斯门(William Eastman)的耐心与帮助,几位编辑的劳作,鲁思·库克(Ruth Cook)熟练的打字技巧,以及美国哲学促进会(The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merican Philosophy)对于美国哲学返老还童所起的作用。

ix

我还要感谢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大量引用《杜威全集》。更要特别感谢本书编辑乔·安·博伊兹顿(Jo Ann Boydston)女士的善意与帮助。

正值本书手稿即将完成之际,我得到了斯利珀(R. W. Sleeper)的新著《实用主义的必然》。除了几处注释以外,很多远见卓识我都没能吸收进来。

导 言

过去的十年,恰好见证了人们对于杜威哲学的兴趣逐渐而稳步的复兴。自从杜威 1952 年以 93 岁高龄辞世,他的思想实际上就日渐黯然失色。这位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最为活跃以及被广泛阅读的专业哲学家,如今在大众心目中,却只留下了模糊的记忆。回想起他,记忆已不那么清晰,只有模糊的教育家形象(或者说严重一点,是罪人的形象,因为他要对进步教育的恶果负责),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及右翼政治家,则仍然把他的名字与达尔文和马克思联系起来。直到近来,他在学界的命运也没有多大好转。我看到那些有终身职位的哲学教授,竭力将他的名字与图书馆目录系统联系在一起,或与杜鲁门的败敌联系在一起。对于杜威兴趣的复兴,除了还继续从事其思想研究的一些学者,以及久富活力的美国哲学促进会以外,主要得归功于一位广受尊敬的分析传统的思想家,即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他一部富有争议的著作中突然出现了杜威的名字。自从罗蒂 1979 出版了《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以及三年后的论文集《实用主义的后果》(*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以来,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一起,杜威的名字在讨伐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运动中一直被援以为据。这三位思想家构成了反本质主义的(anti-essentialist)、反系统论的(anti-systematic)、反笛卡儿主义者的(anti-Cartesian)、反思辨的三人组(anti-speculative triumvirate),他们解构了绝对主义者(absolutist)对于“传统”(the Tradition)的主张。罗蒂断言:“在我们时代,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是发人深省的外围思想家。”说他们是“外围的”,因为他们都是从传统的“边缘”努力融解或削减哲学核心文本的权威,这些文本都自称是真理(Truth)。“这三人都

xi

xii

极尽困难之能事,为的是将其思想表达为对于传统哲学问题的明确观点,或者是将其思想作为建构性的提案,为的是将哲学作为一种合作和前进的学科。”^①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但是某种高级的思想强酸,用于融解哲学问题,而非解决哲学问题。

如此一来,我们得到了一种黏的杜威形象,即作为原解构主义者(protodeconstructionist)、安静而富有颠覆性的思想家,不声不响地腐蚀着古代体制的基础。这种对于学院派而言肯定有吸引力的大众形象,却将其投射到一个普遍的黑屏上,基本忽略了他的著作。与此不足凭信的“新面目”相比,近来对杜威思想有几项纯学术的哲学研究。其中包括詹姆斯·古安洛克(James Gouinlock)的《约翰·杜威的价值哲学》(*John Dewey's Philosophy of Value*)、维克托·凯斯坦鲍姆(Victor Kestenbaum)的《约翰·杜威的现象学意义》(*Phenomenological Sense of John Dewey*)、拉尔夫·W. 斯利珀(Ralph W. Sleeper)的《实用主义的必然》(*The Necessity of Pragmatism*)以及布瓦韦尔(Ryamond)的《杜威的形而上学》(*Dewey's Metaphysics*)。^②此外,不能漏掉由乔·安·博伊兹顿(Jo Ann Boydston)编辑,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杜威全集》这一浩大工程已近尾声。单从这部书的大块头以及较高的学术质量与编辑技术来看,也会使杜威研究面貌一新。对于评价杜威身为哲学家的地位而言,这部书开启了新时代。而且,对杜威进行特立独行的解释,以及未经思索的不屑,都越来越不可能了。就像荷马时代的武士为陷城而战一样,基于杜威资料库文上的争论也已郑重其事地开始了。

① 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68页。(中译本: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345页)

② 詹姆斯·古安洛克:《约翰·杜威的价值哲学》(James Gouinlock, *John Dewey's Philosophy of Value*,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2),维克托·凯斯滕鲍姆:《杜威的现象学意义》(Victor Kestenbaum, *The Phenomenological Sense of John Dewey*, Atlantic Highlands,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77),R. W. 斯利珀:《现象学的必然》(R. W. Sleeper, *The Necessity of Pragma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雷德蒙·布瓦韦尔:《杜威的形而上学》(Raymond Boisvert, *Dewey's Metaphysics*, Fordham, forthcoming),最后一本书我只看到手稿。

本书的目的就是打算进入争论。杜威的著作可谓枝蔓丛生的景致,无论从纯粹的数量来看如此,还是从思想的错综与微妙来说,都是如此。除了要消化如此多的书面材料以外,还需要克服一个主要问题,即以他自己的风格把他看成一位哲学家。有人曾说,解读杜威,就像在燕麦粥里游泳。更好的比喻可能是海德格尔的“林中路”。我们跟随杜威,从他散文中那迂回、复杂的丛林可以得出精微富美的观点,但只有仔细遵循这些路线才能收获。还有一点使杜威的表达更成问题,即他使用通俗英语,这很容易让人上当。他的表达方式与某些人截然相反,比如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通过一种令人迷惑的专业风格,将自己思想的艰深转到了读者身上。我相信,杜威的思想同样难懂且不易捉摸,可他却特意运用那些在通俗上和哲学上已经获得固定意义的术语,因此便掩盖了思想的艰深。换言之,杜威想重建现有的语言,而不是编制一套新的语言。我认为,这一选择有理有据,就是说,杜威想让自己的思想传到广泛的民众中并影响他们,而不仅仅局限于学院中的几个“精英”身上。杜威想用自己的哲学转换文化本身,而且也尝试拉拢(co-opt)这一文化的语言。他深知这是危险的游戏。结果可想而知,杜威那些真正新颖的观点,又被转回到已经建立的理解习惯之中,在这一习惯中,他那些观点不是看起来明显有误,就是琐屑无用。作为杜威思想的中心、也是其核心的“经验”(experience)一词,就是主要的例子。自洛克以来,“经验”这个词就意味着主观之事,由一定的自然(physical)力量作用而引起了存于“心灵”中的诸多“观念”,这些观念构成的观念群(constellation)就是经验。从一开始,杜威哲学就与此背道而驰。对于杜威来说,“经验”意味着自然环境中的过程,社会上共享的符号系统在此中调节(mediate),靠设法使它们最有问题的变成确定的,以此主动探索并回应这个世界的含混之处。杜威的批评者一直没有顺应这些新意义,使得杜威到八十多岁时极为沮丧,其间他草率地放弃了“经验”这个术语和其他几个词。他的主要著作《经验与自然》也重新冠以《自然与文化》(*Nature and Culture*)之名。

xiii

因此,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杜威的哲学进行系统而透彻的思考,我并不概述杜威思想中的大量论题,比伦理学、探究理论、关于教育的



xiv

看法等等,而是打算研究杜威哲学中我认为的核心并具有指导性的思想,即经验的审美维度。要理解杜威使用“经验”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本书这个主题是最佳途径。但是,如果把眼睛主要盯在杜威那众所周知的“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上,而不以经验最完全、最有意义、最富有成就的模式:经验作为艺术去审视经验,那就不可能得到本书这个主题。简言之,我以为,当我们探讨一个成为审美上的积累过程的经验,即探讨形成了“一个经验”(an experience)的经验时,将会发现杜威对于经验的典范性理解。反过来,这也可能促成对于杜威哲学其他部分更为融贯的理解。作为艺术地塑造并在审美上积累的经验,也让我们看到了杜威对于意义的典范性理解。杜威不以科学话语或形式逻辑作为建构意义与交流的范式,而是明确选择了艺术与美学。在探讨杜威哲学时,这是基本的主题,又是相对受到忽视的主题。通过聚焦在“工具主义”,杜威被解读成一位将意义还原为科学程序的“无实证主义者”。如此来看,杜威与其维也纳或剑桥的同行所说的,不仅没什么不同,好像还远远不及他们。然而,杜威并不认为哲学应该集中于经验的认知价值,实际上,他倒正是与此相反。在他看来,西方哲学的主要谬误就是“知性论者的谬误”(intellectualist's fallacy),它们将所有类型的经验最终都视为一种认知形式。(EN, 24; LW 1: 28—29)杜威在处理知识问题时,确实强调实验“探究”这一观念。他不仅将人类知识的工程放在更加广阔而丰富的人类生活的工程这一语境里,而且把知识视为学习的过程,而非“事实”(facts)的堆积,表明他将科学理解为艺术的、创造性的事业。大多数探讨经验的哲学,开始时都特别集中于概念的确定性(可能是“印象”、“感觉材料”或直觉到的“本质”等等)的限定的、确定的时刻(determinate moments),杜威恰好与此相反。杜威的经验主义拒斥把单薄乏味的例子作为范式,转而寻找那种厚实的例子。

工具主义只是一件工具、一套工具论(organon),是为了更加普遍的经验理论而建立的。如果工具主义承认自身有理智转换能力这样的经验概念,那么,仍然有疑问:转换成什么呢?因此,仅仅揭示经验的目的论可能性还不够,还需要处理目的。经验的终极目的(telos)是审美

(the aesthetic)。审美标志着经验成为积累的表现与内部价值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因此,审美就变成了对于任何哲学理解的最终关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有明确表述:“因此,对于审美经验,哲学家必须理解究竟何为经验。因此……某位哲学家所提出的美学理论……是对他提出的一套以把握经验性质本身的体系之能力的检测。任何检测都不若对艺术与审美经验的处理那样,可以明确看出某一哲学的片面性。”(AE,274;LW 10:278)有鉴于此,要是认为衡量杜威哲学对于经验本质掌握得如何,在于杜威哲学对艺术与审美感知的处理,这难道言过其实吗?

xv

不巧的是,杜威的美学已经遭到严厉的批评,这使人怀疑杜威美学与其哲学其他方面的联系。《艺术即经验》中的学说所依赖的前提被认为与唯心主义更为一致,而不是与杜威声称的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naturalistic empiricism)更为一致。^③这些约定已经使得这一工作从内部来看不一致,也与杜威整个思想的精神抵牾。斯蒂芬·佩伯(Stephen Pepper)首先提起这一问题,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紧随其后。因此,尽管该论题也是由其他许多批评家共同建立起来并加以扩展的,但我还是称其为“佩伯—克罗齐论题”(the Pepper-Croce thesis)。当然,杜威对此的回应是置之不理,这对于那些对其所定之罪的批评,没有起到任何阻挡作用。因此,作为杜威哲学中心观念的审美经验理论,要有把握地探讨,就必须先解决好佩伯—克罗齐论题。

这些问题之所以暴露,是由于这一论题呈现了两方面特性:一是关于杜威观念的发展,一是他成熟哲学的系统性质。前者是个非常狭窄的问题。有人认为,杜威的美学危险地(subversively)依赖于一定的唯心主义假设。倘若想一想杜威是以黑格尔的模式开始从事哲学研究,

③ “唯心主义”(idealism)在本书前两章中广泛运用,很明显,“唯心主义”只是一群家族相似的名字,而非严格定义的概念。“自然主义”(naturalism)同样如此。我用“唯心主义”主要是指最终根据“自我”(self),更准确说是通过进行感知或认知的“自我—活动”(self-activity)解释实在(reality)这样的哲学立场。“自然主义”是指尝试将人类存在之现象与更大的宇宙过程联系起来的哲学。应该指出,自然主义的这一定义并不一定限于更加狭隘的形式,那种形式认为所有人类现象都必须归为物理活动或物活动,或者认为科学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本质形式。以此为准绳,杜威并不能归到自然主义名下。